

论儒家文化与青年毛泽东

张恒俊

(湖南科技学院 经济贸易与管理系,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饱读了传统的儒家经典著作,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与体会。儒家文化对青年毛泽东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观、励志精神、人格理想追求和知行观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初步形成了早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关键词:儒家文化;毛泽东;传统文化

早年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涉猎,从先秦诸子、汉唐史家、宋明理学,到晚清的经史子集无不毕览。这些青年时期的深刻印迹终毛泽东一生也难以抹去。五四时期毛泽东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但在中西文化观的比较和评价上,也并没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杨昌济教授)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104}可见毛泽东早期的态度是要对中西文化同时吸收,同时改造,这种处理方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 儒家注重实践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现实主义观的影响

毛泽东早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观。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凡吾思想之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1]203}即认为学、思以及人的行为的目的都在于实践。毛泽东强调将一切思想和学说落实在具体的行动和对现实的改造与解放上。1917年4月他在写《体育之研究》长文的同时又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1]112}1913年8月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三)》中说:“于今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1]145}在致周世钊的信中又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可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234}1921年1月,毛泽东主张把新民学会的方针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些主张都体现了毛泽东注重实践的思想。

毛泽东早期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的人道实践原则相通,密切相关。1913年毛泽东就在《讲堂录》中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1]301}又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206}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阐述智、仁、勇(即德智体)三育并举,引孔子、孟子事迹作为论据,说“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墙之下’”。1917年4月1日在《体育之研究》中又说:“惟北方之强,任金戈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1]425}列举明末清初学者颜元、李塨、顾炎武的事迹说:“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1]328}其实不只这几人,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注重实践锻炼的儒家风范随处可见,所谓“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苏张纵横”(1919年7月《致友人信》)等等,比比皆是。

青年毛泽东注重社会实践的思想,更与儒家追求道德人生和艺术人生相结合有关。孔子曾在鲁定公九年出仕,做大司寇三年。在周游列国之间孔子并非只是单一的追求他的政治理想。《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卫曾学琴于师襄,师襄又称击磬襄。孔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在卫国刚刚定居,就击磬自遣。这些都是孔子在流亡期间怡情于音乐的艺术生活;可见孔子逐渐将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相融合。孔子的这种求道与探索精神也被后世知识分子所大力推崇。如司马迁寻访天下而著《史记》;顾祖禹遍历大江南北而著《读史方舆纪要》;徐霞客也游历天下名山大川;顾炎武虽然是南方人但好骑马而居北方。这些做法无不是儒家为追求“明道而游天下的人格写照。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在一师求学期间他曾在自己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

收稿日期:2009-03-21

作者简介:张恒俊,男,湖南东安人,湖南科技学院经济贸易与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文化史。

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仲尼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之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1]412}毛泽东曾利用暑假和自己的好友萧子升徒步旅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一路上他们切磋学问,拜访学者;体验社会人情风貌。如果说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改造中国的想法,那么他至少学会了追求孔子的“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相融合”的人格精神了。

二 儒家本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励志的影响

毛泽东1917年在致白浪滔天的信中表白自己“尝读诗书,颇立志气”。^{[1]415}儒家人生哲学作为一种入世哲学,它为传统士人设计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向。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治国平天下,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中。格物致知是儒学修身的内容之一,其根本目的在于“穷天理”,即获得对世界本源的认知。孔子的孙子子思最早探究了本源问题并提出了“诚”的概念,认为“诚者天之道”,“诚”是万事万物得以产生的本源。到了宋代,儒学大师们大大发展了关于本源的理论。作为宋儒理论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太极即理,理是超绝时空的永恒存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万一天地山河都陷了,毕竟理还在这里”。所以“本源”在儒学大师那里指的是宇宙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精神实体。对于宇宙本源,在传统儒学作为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坍塌之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的追问和探寻。青年毛泽东认为,要成就外王的事业,就必须洞悉和掌握宇宙的本源。他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1]321}毛泽东希望通过自己的求索,掌握本源,从而达到圣人的修为。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1]156}他决心探求大本大源,掌握宇宙真理。他向友人表示:今后“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1]207}

而探索大本大源的前提则是“先博后专”。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孔子精通六艺,当时人都说孔子是多才多艺的,但孔子的志向是追求“道”,即“仁道”也就是立人、立事、立己的根本所在。艺亦有道,但拘泥于一艺则只能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为“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积小德以成大德。艺既是道而不鄙矣,但万万不可拘泥于一艺。因此孔子又说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显然历代受儒学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打上了“志在明道”的烙印;于是有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于是有王阳明整日对竹而坐,观察竹子,以践行“格物致知”的极端行为。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提倡博学,博学的目的在于相互渗透,相互印证,从而向明道迈进。显然从私塾里背诵《论语》而长大的毛泽东也必受此影响。

1915年毛泽东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信中特别提出了“博学才能通达”这一观点。他在信中写道:“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地理者采通识为最多也……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也”。^{[2]123}毛泽东早年曾自动要求从湖南高级中学退学到省图书馆自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涉猎知识;博学之,慎思之,以通达之志而明道。毛泽东自己也说:“我早晨进馆,半年多从无间断,只是中午花去买两个米饼吃的时间,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里一样……”。^{[1]159}而在一师求学期间的毛更是受此影响至深,他为了求得通达之识,经常花去自己生活费的大部分用于购买报刊杂志,希望能获取更多的社会时事知识。

毛泽东读《曾国藩家书》时体会到为学最忌一陋字,曾文正以四者为科:一曰义理,以《论语》和《近思录》为主;二曰考据;三曰词章;四曰经济。于是毛下决心要通达国学常识,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若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1]502}1919年毛泽东草拟了《问题学会的章程》,在章程中所要研究的诸多问题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教育、军事、地理、思想、医学等领域,不可谓不博矣。

青年毛泽东曾在长沙多所学校求学,但最后都因其不符合自己的志向而一一退学。他认为:“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羨其成功而盲从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则应向宇宙之大本大源处着手”。^{[2]45}

三 儒家的君子之道对青年毛泽东人格理想的影响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最早最基本的载体之一。《论语》里经常拿小人跟君子做比照;千百年来受儒家思想控制的中国,君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是君子,儒门弟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因此人们追求君子之道便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了。

在儒家的思想意识里,人之为群,不可以无家庭父子,也不可以无邦国君臣,因此伦理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君臣、父子、家庭则人伦之道大乱矣。君子不愿意乱人伦之道,所以君子入仕以行其义。不能使君子不义而仕,但君子也不必因此去认为“仕为不义”。孔子尝欲居九夷;又说要:“乘桴浮于海”,也存在隐者的想法,但孔子最终坚持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孔子的这种敢于担当世事的精神被尊为至上至尚的人格。历史上有诸葛武侯、范仲淹这些敢于担当世事的英雄人物,显然青年的毛泽东受此影响极大。

毛泽东在他的自传里说道:“我特别喜欢读一些时论和新书,我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我读而又读

以至能诵,它的开头是‘呜呼!中国将亡矣!’从此我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365}毛泽东还作诗《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以此来表明自己要担当世事的志向。《致黎锦熙》的信中也说:“盖举世昏昏,皆是误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与立身处世之道”。^{[1]426}他还曾说:“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以斯世者,吾人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1]164}这时的毛泽东乐于追求君子之道,并且以此志向。

子曰:“宁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君子之儒在于能担当世事,守正恶邪。而小人之儒则不出两种: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而忽视义理。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曾经是乞丐》一书中记述到这样一件事情:萧子升有一篇《评严子陵祠堂记》的文章,认为严子陵不辅助光武帝而选择避世隐居是道德楷模,而毛则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刘秀做了皇帝之后严光就应该出任辅相,正如汉高祖时的张良所为。为此他们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如此争论可见两人的见解分歧很远;但透过争论不难看出毛是一个渴望并勇于担当世事的人,是一个入世的儒家知识分子形象。毛曾为探索世界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而忘情于书本和社会实践中。可见他是十分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那种纯文人之儒的。毛泽东早年创立的新民学会的组织细则中,反复强调会员要有良好的道德行为。而且一一做了规定。可见君子之道是毛追求的理想人格。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不会被外部物质条件所屈服的,君子是以内心修养而去把握幸福的。青年毛泽东常常是身无分文,物质生活条件极为清苦。按理而言,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当求一职业尽快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但毛却并不以为然。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到:“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然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自少一份收入,又须费用,此为难矣。然拟学颜回之一瓢饮,一簞食;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1]362}由此可见物质上极穷而精神上极富的毛以内心修养来克服物质上的贫困,与孔子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相通的,儒家思想的修养默化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四 传统儒家心学对青年毛泽东知行观的影响

纵观毛泽东的早期活动,其重视对观念和思想的改造(“涤除旧思想、开发新思想”),更重于对社会的直接变革。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知显然重于行,行是为知的改造服务,二者统一于除旧布新之目的中。

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心”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他在《讲堂录》中写道:“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1]354}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简称《第

三札》,下同)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1]265}从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唯心论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传统文化的积淀。首先是宋明理学的影响。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就是宋明理学的提倡者,“在中西两个渊源中,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而宋明理学尤为杨昌济所推崇”。^{[1]107}毛泽东在《第三札》中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1]141}这与朱熹“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的宇宙生成论何其相似。太极即理,理即世界的本大本源。早期毛泽东认为,通过“内省”认识了这种本大本源,以之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1]309}此时理为宇宙之本源,但又与心相通。

正因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所以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人观念和精神的改造。在《第三札》中认为中国积弱积贫,根本原因在于“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1]242}因此,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是实现其大同理想的切入点和手段。他说:“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1]287}他还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1]369}然而实现上述之目的,需现实之手段,这便是教化。他在《伦理学批语》中说:“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1]418}显然,他认为学习教化可以改造人心,他认为,“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之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1]306}这与朱熹“知先行后”的观点极其相近。宋明理学对湖湘学风影响深远,毛泽东也必然受到其熏染。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逐步突破传统文化束缚的过程。最初的文化构建,传统文化在其头脑中形成了基本框架,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特别是在现实主义方面对学以致用、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儒家文化开放的人道实践原则的继承和创新。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更进一步地接受了开放的、分析的思维方式。用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步骤。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2008
- [2] 斯诺笔录.毛泽东自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骆晓会)